

五代分合与南唐的历史地位

吴枫 任爽

内容提要 中国历史的分合,原因不一,结果也不相同。但是,与统一时期相比,分裂时期给予中国历史发展的助力也不可忽视。南唐是五代十国时期割据江淮的一个小王朝。尽管南唐仅有39年的历史,但是,在其统治之下,江淮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仅对当时中国的分合大势,而且对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五代十国的政治形势来说,各割据政权实际上是以中原和江淮为核心,形成了对立的两大集团,互相对抗,互相牵制。南唐虽然没有实现统一天下之志,但对于阻止中原政权兼并南方,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南唐政权的存在,是以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得以持续的一个关键因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江淮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为后来的统一与发展提供了保证。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的一个关键环节,南唐不仅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且应该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南唐是五代十国时期割据江淮的一个小王朝。历烈祖李昇、元宗李璟、后主李煜三世,传39年。当其极盛之时,据有35州之地,人口约500万。

南唐39年的历史,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长河之中,并不十分引人注目。因为无论就其版图的广狭、人口的多寡、传世的久暂,都无法与历代强盛的统一王朝相比。因此,正统的旧史家如薛居正、欧阳修,在新、旧《五代史》中,把它列入“僭伪”、“世家”之类,以彰其“攘窃”之罪;非正统的旧史家如马令、陆游,在其《南唐书》中,虽有意推崇,但仍以“诛乱尊王”、“笔削春秋”为辞;明、清两代,陈霆撰《唐余纪传》、吴非撰《三唐传国编年》、陈鱣撰《续唐书》,牵强附会,又把它当作大盛世的余波。近年以来,尽管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学界对这一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却还是不能摆脱通史与断代史的局限,从而对南唐历史地位的全面展示与充分估价。

南唐的历史地位,并不在于它是否是正统王朝,而在于在这一时期之中,江淮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增强了南唐的国力,使其得以北拒晋、汉、周,南威闽、楚、越,独霸一方,虎视中原,有混同环宇、一统天下之志;而且在北宋统一以后,南唐故地仍然继续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五代纷争,十国扰攘,分合之际,世变之时,南唐承上启下,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不了解这一点,不仅不能真正认识南唐的历史地位,也不能真正认识唐宋之际天下分合的基本形势。

南唐承扬吴之基绪,据有江淮。“控朱方而定霸,总泽国以称雄”^①。其地北隔长淮与中原相对,东邻闽、越,西有荆、楚,南倚南汉,处于南北中国交通之冲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唐末大乱,群雄逐鹿,其较强者无不以统一中国为己任。而在这场角逐之中,中原与江淮是两个实力最强的地区,争夺也最为激烈。南唐与中原政权之间的抗衡,必然牵涉到周围诸国。南唐、楚、荆南、后蜀等国,由东到西,形成一道屏障,阻止了中原政权向南中国的进攻。因此,中原政权与南唐对垒,必先从其邻国下手;南唐欲求自存,亦需团结南方诸邦,并设法从中原背后寻找同盟。以此为基点的军事与外交活动,从五代十国初期即已开始,并且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即:中原政权争取了吴越与楚,从东西两侧威胁南唐;南唐则竭力拉拢荆南、后蜀,以解除楚国在西面的牵制,并与契丹结盟,从背后骚扰中原政权。概括地说,五代十国各割据政权实际是以中原与江淮为核心,形成了对

立的两大集团,互相对抗,互相牵制。这一时期之中,整个中国的政治形势,就是以此为特点而逐步发展的。

中原与江淮两个地区之间的矛盾冲突,根深蒂固,由来已久。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说,中国是一个由若干相对封闭的小面积空间组成的相对封闭的大面积空间。以黄河、长江为线索,我们可以把古代中国划分为两大区域。在这两大区域之中,又分别存在着若干小区域。两大区域及其所包含的各小区域之间,不仅在地形地貌、气候土壤、植被物产等自然条件方面千差万别,而且山川纵横、关津阻隔、交通不便。在这一基础之上,是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形态。小农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地理环境的恩惠,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在长期维持简单循环的状态之下,形成了社会分工极不发达、商品经济受到严重限制、各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的局面。这种局面不仅使各地区之间潜伏着深刻的利益冲突,而且使国内各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势力在本质上缺乏凝聚与统一的坚实基础。因此,从实力对比的角度来说,大一统王朝的出现与维持,是统治者凭借经济、政治、文化占优势的区域对劣势区域实施控制的结果。这种控制自然不排斥劣势地区的发展与进步,但是,经济上的掠夺,政治上的排斥与文化上的歧视,作为这种控制的本质内容,不仅妨碍劣势地区的发展与进步,而且妨碍双方的交流。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地域矛盾的化解而只表明一种缓和。在盛世的掩盖之下,以前遗留下来的旧矛盾与不断形成的新矛盾逐渐积累、激化,一旦王朝的统治基础发生动摇,地域矛盾就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出来,造成分裂局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不从根本上解决地域矛盾,分裂便永远是大一统王朝的归宿。

唐朝后期,江淮一带发展迅速。中原地区逐渐失去了传统的优势地位。这一变化的结果不仅是赋税所出倚办于江淮,而且是这一地区有能力与中原抗衡。唐末大乱,天下血战,中原地区鞠为荒野。乾宁四年(897年),朱温与杨行密大战于清口,朱温惨败,“还者不盈千人”,杨行密从此“保据江淮”,形成了“汴人不能与我争”的局势^⑤。及南唐得国,江淮与中原之间的对峙局面并没有大的改变。自李昇为吴相以来,休养生息,保境安民,20余年之间,江淮地区桑柘满野、物阜民丰,“兵食既足,士乐为用”,猛将谋臣皆有建功立业之意。于是纷纷上言,或建议出兵中原,恢复唐室;或主张攻取楚越,以固根本。李昇虽然反对轻开兵衅、妄起战端,但是,“痿人不忘起,盲人不忘视”,“每思高祖太宗之基绪,若坠丘谷”^⑥。及李璟即位,与中原的军事斗争渐次展开。保大六年(948年),后汉伐河中,李守贞向南唐乞援,李璟为之出师,进至沂州。七年,出师渡淮,进攻正阳。九年,复议北征后周,耀兵于淮上。同年,出师援助兖州,至于沐阳。这些举动虽然规模不大,也未获得成功,但其中反映出的问题,却是南唐在与中原的抗衡之中,处于攻势。一直到保大十三年(955年),后周大举南伐,夺取淮南,南唐称臣纳贡,奉周正朔,形势才有根本性的变化。

为了对中原政权进行牵制,南唐与契丹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南唐得国之初,李昇采纳宋齐丘之谋,结好契丹,“以取中国”。于是“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契丹主亦遣使报之”^⑦。李璟在位时,南唐与契丹“岁遣单使往复”^⑧。“虜使至则厚币遣还。迨至淮北,辄使人刺之。复遣使浚海廊琛宝以报聘。虜意晋人杀其使,数犯中原。”^⑨这种计谋的运用,确实给中原政权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及契丹灭晋,甚至还遣使至南唐,云:“晋少主逆命背约,既遣使入蕃。虜主欲与君继先君之好,将册君为主原之主矣!”^⑩一直到保大十二年(954年),述律遣其舅为使,来到南唐,在清风驿夜宴之时,被后周大将荆罕儒派人刺死,南唐与契丹的往来才中断。

南唐联络契丹牵制中原政权,中原政权亦竭力拉拢南唐的邻邦对其进行反包围。其中吴越与楚是中原政权的主要同盟。吴越处于南唐东面,据有两浙。唐末,杨行密夺取淮南以后,吴越不仅在西、北两面直接受到吴国的包围,而且与中原的陆路联系也被切断,形势十分不利。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吴越与吴国对淮南的东部展开了长时期的激烈争夺。及吴国与后梁矛盾加剧,朱温便利用吴与吴越之间的冲突,拉拢吴越。开平元年(907年),朱温封钱镠为吴越王,使其“兼镇广陵”。其目的就在于“方赖率三军而挺荆楚,纠列国以平淮戎。允为东海屏藩,永保中原重镇。”^⑪此后,中原虽屡经改朝换代,这一政策却始终不变。而吴越处于江淮政权的威胁之下,也需要与中原保持密切关系。钱镠临终,属其子曰:“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其中深意,即在于此。南唐初年,李昇以保境安民为国策,与吴越的关系有所缓和。及李璟即位以后,与中原政权的冲突加剧。与吴越的关系也迅速恶化。这一时期中,两国战祸频起,而吴越的军事行动往往与中原政权互相呼应。为了对付吴越,南唐乘闽国内乱之机出兵占据建州,灭亡闽国,形成了对吴越三面包围的形势。吴越虽然夺得福州,击败南唐军队,但迫于形势,仍然不得不向中原政权求助。保大十年(952年),吴越向后周乞师,希望“朝廷聊出天

兵,以为倚角之势^[40],准备与南唐大动干戈。及后周伐南唐,周世宗谕吴越:“出兵会击金陵”,又诏其“以国兵他路进讨”^[41]。于是,吴越出兵,进攻常、宣二州,对淮南战局影响很大。

楚国处于南唐西面,据有湖南。楚国与吴国争夺岳、鄂一带,累年战争,与南汉、荆南的关系也很紧张。所谓:“淮南为仇讎之国。番禺怀吞噬之志,荆渚日图窥伺”。^[42]这种三面受敌的形势,迫使楚国不得不与中原政权搞好关系。当杨行密与朱温对抗之时,曾试图与楚联横,马殷惧吴之强,也打算与之修好。但是,大臣高郁认为:“成汭地狭兵寡,不足为吾患;刘龚志在五管而已;杨行密公之仇讎,虽以万金赂之,不能提其欢心。莫若上奉天子,下抚士民,训卒厉兵,以修霸业,则谁与为敌矣!”于是楚国“始修贡京师”^[43]。朱温即位以后,出于与吴国对垒的需要,封马殷为楚王。同对待吴越一样,中原凡改朝换代,照例加封,使之与江淮政权为敌;而楚国同吴越一样,也始终不肯称帝。南唐初期,李昇奉行保境安民政策,与楚国的关系大为缓和。升元中,南汉曾遣使请与南唐共攻楚,以分其地,李昇未加理睬。及李璟在位,与中原大动干戈,与楚国的关系也逐渐恶化。保大九年,楚国内乱,马希萼与马希崇兵戎相见,南唐遂借机出兵,一举灭楚。当时,楚废王马希广曾遣使向后汉告急,云:“荆南、岭南、江南连兵欲发湖南之地,乞发兵屯泔州以扼江南、荆南捷朗之路。”^[44]后汉将发兵入援,不料内难发作,其议遂寝。后来,王逵据朗州,击退南唐军队,楚地得而复失。及后周伐南唐,拜王逵为南面行营都统,以攻鄂州。

南唐联络契丹牵制中原,中原政权则利用楚、吴越夹击江淮;而南唐又竭力与后蜀、南汉、闽、荆南诸国搞好关系,对楚与吴越进行反包围。在这场大规模的战略较量之中,南唐先胜后败,其中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南北两大区域互相抗衡之际,南方各小区域之间的纷争削弱了它的整体优势,使中原政权有可乘之机。这种局面的存在,使南唐难以发挥其战略优势。恰如李昇所叹:“地势未便,犹如绘事,窘于边幅。虽有手笔,无所纵放。毛遂云:‘锥未得处囊中故地!’”^[45]但是,南唐的存在,尽管使南方诸国耿耿于怀,实际上却与它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南唐丧失淮南之后,吴越与中原的陆路交通被打开,同时也使其直接受到中原政权的威胁。北宋初年,吴越遣使入贡,宋太祖对使者说:“汝归语元帅,江南倔强不朝,我将讨之。元帅当练兵甲助我,无惑人唇亡齿寒之言。”^[46]开宝七年(974年)宋师伐南唐,授钱俶东南面招讨制置使,命其出兵助战。大臣沈虎子谏曰:“江南,国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将何以卫社稷乎!”^[47]李煜亦致书吴越,言“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一旦天子易地赏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48]然而,此时的吴越,已是不得不行。南唐灭亡不久,钱俶即被迫献地纳土。楚国助后周进攻南唐,及南唐丧失淮南,楚国的处境日益窘迫。宋乾德元年(963年),太祖出兵击楚,周保权军溃,国遂灭。南汉素以南唐为屏障。及后周伐南唐,南汉主闻南唐屡败,忧形于色。乃“遣使人贡中朝”,同时“治战舰、修武备”。又说:“吾身得免,幸矣!何暇虑后世哉!”^[49]由此可见,南唐虽然没有实现统一天下之志,但对于阻止中原政权南下,却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的存在,是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得以持续的一个关键因素。

二

五代分合之际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不仅是地域矛盾所导致的国家分裂,而且是地域矛盾所导致的社会分裂。

中国地理环境的局限性不仅表现为内部各小区域之间的相对封闭,而且表现为与外部世界的相对隔绝。在这个由山川关津分割开来的许多小区域组成的大区域之外,东南两面濒临浩瀚的海洋,西面绵亘着高大的山脉,北面则是广袤无垠的沙漠草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代中国赖以沟通外部世界的陆、海丝绸之路不绝若如线,时断时续,其作用实际上极为有限。这种内外双重封闭的地理环境一方面使文化的发展与延续具有稳定性,易于形成并保持传统;另一方面则使各地区之间的往来受到限制并且尤其不利于国际交流。其结果是中国古代文化呈现出区域文化色彩杂陈的局面,而在整体上则由于缺乏大量外来文化因素的强烈刺激难以打破相对固定的格局,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保守与排外倾向的形成与蔓延。同地区间的闭塞与隔膜相表里,小农经济赋予社会结构的封闭性与分散性这两个特征不仅限制社会成员交往的广度与深度,而且模糊其交往的界限。在温文尔雅的外表掩盖之下,人际关系的非正常性发展造成了社会的严重变形。一方面,小

农经济对地理环境的高度依赖对主体人格的伸张是一种天然的束缚,而社会结构的封闭性、分散性以及社会关系的非正常性又不可能为主体人格的适度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社会依据。其结果不仅是社会成员自我意识的盲目,同时也是社会成员群体意识的淡漠,使社会中很难形成具有共同政治倾向、经济利益以及文化品格的阶级或阶层,而往往是以特殊形势为契机,组成特殊性质的各种集团。这些集团不仅不能长期存在,而且结构松散,在同其它集团发生矛盾时,内部的冲突往往更加剧烈。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自我意识的盲目、群体意识的淡漠以及社会关系的非正常性影响于政治,不仅使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体制从一开始就是具有专制精神,而且为其逐步发展与强化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专制政治是以封闭性、分散性为特征的社会结构的必然产物。专制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君主的孤立。与之相适应的是臣民之间的相互孤立。没有这种臣民之间的相互孤立状态,专制君主就不可能有效地维护其统治地位。社会舆论对“无党”的竭力褒扬,专制君主对“结党”的深恶痛绝,可以说非常深刻地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结构的组合方式及其稳定条件。

封闭的地理环境、矛盾的经济形态、变形的社会结构与不断发展、强化的专制政治相互作用,造成了血缘宗法关系的根深蒂固,造成了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共同基础的各种区域文化传统的绵延不绝。这种区域文化传统的内在倾向之一是以家族观念为主体的极端排外并进而演变为以地域观念为主体的极端排外。当孤立的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与小农经济相伴而生并因此具有封闭性特点的血缘家庭关系便成为唯一可靠的支点。于是便有了社会各个领域形形色色的裙带关系;当冲突进一步扩大到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时候,与小农经济、血缘家族关系相伴而生并因此同样具有封闭性特点的地域关系便成为唯一有利的屏障,于是又有了政治斗争中大大小小的地域集团。在这里,家族事实上是地域集团的核心,而地域集团的本质则是家族的放大。在中国古代社会频繁发生的利益冲突之中,家族与地域集团互为表里,唇亡齿寒。

以地域矛盾为契机,以地域界限为派系分野标志进行利益争夺,往往是中国古代统治集团内部冲突的一个重要特征。尤其是南方人士与北方人士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在五代之前,这种矛盾还主要局限在小范围之内。由于中原与南方广大地区相比,在政治、经济、文化实力上一直占有十分明显的优势,所以,即使王朝南迁,中原人士在统治集团中也处于无可争辩的主导地位,在与南方人士的冲突中,中原人士始终是胜利者。但是,唐宋之际,南方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地理与文化地理的原貌,使南北中国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使中原人士在统治集团中的主导地位受到严重挑战,从而引发了空前激烈的南北冲突,而且影响到这场冲突的结局。在唐宋分合之际,南唐既处于关键时期,又处于关键地点,其内部的政治斗争就不能不深刻地反映出时代以及地域上的特点。

南唐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错综复杂,斗争十分激烈,从李昇为吴相,筹划以唐代吴开始,一直持续到南唐灭亡。既波及很广的范围,又牵涉众多的人物。但是,尽管在不同时期内双方斗争的焦点不尽相同,各自的主张也时有变化,两派之间却始终保持着—个清晰的界限。这个界限,就是两派人物之间的地域差别。

李昇是海州人,少孤流落,后来被吴国权臣徐温收为养子,并且借助徐温的势力掌握了吴国的政柄。这期间,李昇虽然几经曲折,却并未遇到特别棘手的难题。但是,当他进一步试图取代杨氏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吴国政权是一个以当地人为主体、以淮南人为核心的地方性割据政权。《十国春秋》吴国列传部分载吴国将相大臣家世可考者71人,其中当地人42位,约占总数十分之六;当地人中,淮南人28位,占总数十分之四,占当地人十分之七。杨行密本人就出自南庐州。因此,淮南地方势力在吴国政权内部根深蒂固。李昇的养父徐温曾经试图取代杨氏,就是因为庐州籍将领刘威、陶雅、李遇等人合力抵制,甚至“密议诛温”而告搁浅^①。李昇经营南唐,遇到的也是这一问题。史载:“列祖辅吴之初,未逾强仕,元勋硕望,足以镇时靖乱,然当时同立功如朱瑾、李德诚、朱延寿、刘信、张崇、柴再用、周本、刘金、张宣、崔太初、刘威、韦建、王绶等,皆握强兵,分守方面。由是朝廷用意牢笼,终以跋扈为虑。上虽至仁长厚,犹以为非老成无以弹压。”^②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多为当地土著,并且对李昇抱抵制态度。如德胜军节度使兼中书令周本,多次扬言于朝路,表示不肯“推戴异姓”^③,同时支持临川王杨濛与李昇抗衡。及杨濛被杀,李昇代吴已成定局,令其率众拥戴,周本还说:“我受先王太恩,自徐温父子用事,恨不救杨氏之危,又使我为此,可乎?”^④李昇老谋深算,其为人:“内谋其家,外谋其国。劳心役虑,数倍于曹、马。”^⑤为了扫清代吴的障碍,李昇一方面对杨氏旧臣竭力怀柔,“高位重爵,推与宿旧”^⑥;“一骑一卒,必加姑息”^⑦。另一方面则积极扶持自己的势力。首先是大力招徕、奖拔北来士人。史载,李昇“于所居

第旁创为延宾亭,以待四方之士。遣人司守关徼,物色北来衣冠,凡形状奇伟者必使引见,语有可采,随即升用。”^②南唐政权中著名的北方人士如孙晟、韩熙载、常梦锡、马仁裕、王彦俦、高越、高远、江文蔚等,都于此时聚集李昇周围,成为他的腹心。其次,着意搜罗当地特别是江南一带地位尚很卑微的小人物。南唐政权中著名的当地人士如宋齐丘、陈觉、查文徽、冯延巳、冯延鲁、边镐、游简言、何敬洙等,都是此时投其门下,白衣起家,由李昇一手扶植起来。经过20年苦心经营,李昇不仅大大缓和了杨氏旧臣的敌对情绪,达到骁勇凤将元寮素所跋扈者无不乐从的目的,而且拉拢起支持他的北方人与江南人两大势力,所谓“羽翼大成,俾佐弥众”^③,终于取代杨氏,甚至做到“上下顺从,人无异意”,以致虽吴社迁换而“国中夷然无易姓之戚”^④。但是,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南唐政权结构与吴国相比,虽然有所变化,却并无根本性的不同。马令与陆游所撰两部《南唐书》中,将相大臣家世可考者82人,其中当地人47位,约占总数十分之六;当地人中,江南人士29位,占总数近十分之四,占当地人十分之六。虽然北来的李氏取代了土著杨氏,但是,当地势力仍然是南唐政权的主体,只不过淮南人换成了江南人。淮南地方势力同北方势力的角逐,由于江南人的倒戈而告失败,然而,江南势力同北方势力的矛盾却随着南唐的建立而日渐显露,并且爆发出更大规模的冲突。

史载:“南唐之士,……宋齐丘、陈觉、李徵古、冯延巳、延鲁、魏岑、查文徽为一党,孙晟、常梦锡、萧俨、韩熙载、江文蔚、钟谟、李德明为一党。”^⑤此语不仅点出了两派的主要人物,同时也指出了双方的基本分野。宋齐丘为首的一派中,除魏岑以外,都是当地土著,而孙晟为首的一派中,除萧俨以外,都是侨寓人士。如果全面考察一下所有那些与派系斗争有关的人物,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斗争着的两派按这些人物的籍贯来决定对他们采取何种态度,而这些人也各依自己的籍贯,分别站在宋派或孙派一边。翻开南唐史籍,南北人士之间的倾轧无处不在,不胜枚举。可以说,整个南唐政权实际上是以籍贯为界限,分裂为截然对立的两大阵营。

南唐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冲突在李昇时期已见端倪,并且围绕着首赞禅代之功的争夺发生了数次纠纷。但是,由于较有统治经验的李昇注意使当地人士与侨寓人士之间保持力量平衡,因此,这一时期中双方的矛盾尚未演化成大规模的冲突。及至元宗李璟时期,这种平衡因土著人士势力迅速膨胀而不复存在,双方矛盾随即尖锐化,斗争也就进入高潮。史载:“及宋子嵩(齐丘)用意一变,群俭人乘资以聘,二冯(延巳、延鲁)、查(文徽)、陈(觉),遂有五鬼之目。望风尘而投款者,不可以数。”此时宋齐丘为相,陈觉为枢密使,冯延巳、游简言为翰林学士,土著人士“在外者握兵,居中者当国”^⑥,在朝廷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双方的矛盾,自然包括政见分歧,但是,隐藏在政见分歧背后的,却是无法调和的派系利益。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冲突完全超出了政见分歧的范围,演变成了不顾大局的派系倾轧。这场倾轧消耗了南唐的国力,使其在与中原政权的抗衡中遭致惨败,影响不可谓不大。但是,这场倾轧还有另外的含义。在这场空前的社会分裂中,南方与北方同样进行了较量,其结果是南方获得了胜利。在争夺统一权的斗争中,南方是失败者;而在争取政治地位的斗争中,南方却是胜利者。胜利的南方人在经过了这场短兵相接之后,将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显露身手。

三

国家与社会的分裂,从根本上来说,是各地区之间缺乏凝聚基础并且发展失衡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军事与政治的较量只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暂时性手段。冲突自然是一种交流,有助于各地区之间相互了解与认同。但是,冲突无疑又妨碍交流,只有充分的建设,才有可能彻底克服地理环境、经济形态、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本身所有的局限性,为各地区之间的凝聚提供条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正是因为有了不断的建设,才形成了真正的统一,但是,在大一统王朝之内,非中心区域的建设往往因政治上的排斥、经济上的掠夺以及文化上的歧视而困难重重,而在分裂的形势下,非中心区域往往由于摆脱了这些不利因素,获得前所未有的进步。这是一种潜在的对抗,意义深远。在这种对抗之中,南唐竭尽全力,成就显著。尤其在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方面,南唐的成功,令人瞩目。

南唐经济的发展,主要得力于两个条件。其一,和平局面的维持,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这一条件的获得,既与当时的形势有关,同时也与统治者奉行的政策有关。南唐得国,大规模的战争已经基本结束,各割据政权之间处于相对均衡状态,进一步的相互吞并实际上已经不可能。特别是南唐政权刚刚建立,亟需稳定

内部,因此竭力奉行安民保境政策。除此以外,南唐统治者个人的经历,对这一政策的推行,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李昇少孤流落,生长兵间,对战争带来的社会经济残破、人民生活痛苦深有感受,每言:“百姓皆父母所生,安用争城广地,使人肝脑异处、膏涂草野!”³⁴当时,群臣争相进言,建议出兵拓展疆土,李昇太息曰:“吾少长军旅,见兵之为民害深矣。不忍复言。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³⁵因此,从其执吴政以来,即休兵罢战,敦睦邻国,以致于“仅将一纪,才一拒越师”³⁶;及南唐得国,更是“在位七年,兵不妄动”。李昪时期,虽然同中原与南方邻国发生了数次战争,但境内基本上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特别是长江以南地区,数十年战乱不及,“男不失耒耜,女无废机织”,经济建设得以正常进行。其二,统治者鼓励经济发展的政策,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些政策主要包括:1. 招抚流民、增加户口;2. 兴修水利、扩大垦田;3. 改革赋税、劝课农桑;4. 发展工商业,扩大对外经济交流。

良好的外部环境与强有力的政策,使南唐统治下的江淮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这些成就不仅使南唐政权有能力与中原政权抗衡,而且对北宋统一以后的经济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唐宋之际经济重心南移的一个重要环节与中心内容。

人口增加,既是经济发展的条件,又是一个重要标志。把《元和郡县志》与《太平环寰记》作一粗略比较,我们就可以从中窥见这一时期中江淮地区人口增加的大概趋势及其对中国古代人口布局的影响。唐开元年间是中国人口增殖的高峰时期之一。安史之乱以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但到了元和年间,江淮大部地区户口数比开元时期还是有所下降。及到宋初,江淮户口数远远超过了开元。其中许多州郡,户数有成倍甚至近十倍的增长。唐代及唐代以前,中国人口以中原地区最为集中。天宝年间,全国每平方公里平均人数为13.8,其中都畿道为58.7,居全国第一位;河北道为56.76,居第二位;京畿道为46.41,居第三位;河南道为38.2,居第四位。而后来大部属于南唐的江南西道则为11.35,处于全国平均数以下。及北宋崇宁年间统计,全国每平方公里平均人数为18.1,其中大致相当于唐代江南西道的江南东西二路,前者为24.9,后者为27.7,都超过了全国平均数,跃居前列,中原地区则失去了原来的地位³⁷。由于缺乏年代更近的资料,我们不能对南唐人口增长的幅度进行更精确的统计,但南唐的贡献是相当明显的。

这一时期中江淮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南唐“比年丰稔、兵食有余”,而且对宋代农业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以粮食产量的增加为例,唐开元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中,由江淮漕运到京师的粮食共700万石³⁸,这是唐代漕运数的最高峰。唐代后期,江淮地区成为中央政府最重要的经济来源。然而,统治者大肆搜刮,每年由这一地区运出的粮食也不过40万石左右,而且经常不达此数³⁹。及至宋初,江淮漕运额骤增至每年400万石⁴⁰,比唐代最高年额增加近一倍,比唐代后期增加近十倍。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东南六路岁运米620万石,其中原属南唐的淮南、江南东、江南西三路即为370万石,占总数60%⁴¹。

在手工业方面,南唐的纺织业、印染业、矿业、制茶、造纸、晒盐、造船、金银陶瓷、文具制造等,均有突出成就。不仅产量高,而且工艺精细,涌现出许多名产上品。宋代初年,江淮出产的丝织品、铜、银、茶,约占全国产业二分之一。手工业名品,如醒骨纱、天水碧、京挺茶、澄心堂纸、龙尾砚、李廷珪墨、诸葛笔、句容铜器、二仪刀等,各具特色,为宋人所珍爱。

南唐文化事业的发展,同经济发展一样,既得力于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又得力于统治者的提倡。

安定、富强的南唐,在五代十国时期,成为饱经战乱沧桑的文人士大夫理想的栖身之所。史载:“时中原多故,名贤凤德皆亡身归顺。”⁴²南唐统治者亦大力招揽,从而出现了“北士士人闻风至者无虚日”的局面。大批北方士人涌入南唐,对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推动。这些人来到南唐后,或卜居乡野,教授学徒;或大开门馆,延纳彞彦,提奖后进。对提高当地人的文化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江淮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有远见的当地人自己动手与办教育事业,对文化的发展,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中如江州陈氏、奉新胡氏、建昌洪氏、泰和罗氏、庐陵刘氏、奉新罗氏所建之书楼、学舍、书舍、书院,规模较大,名著于时。其余私学,不可胜计。这种私学书院,不仅在当时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对宋代书院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南唐政权对教育事业也十分重视。李昇初年,即于淮水之滨设立太学。升元四年(940年),又于庐山白鹿洞建学馆,号庐山国学。所属各州县旧有之官学,因而不废,一些地方还兴办了新的学校。除此之外,南唐统治者还大力提倡文风。李煜曾劝诫近臣“卿辈从公之暇,莫若为学为文。”⁴³上濡下染,蔚成风气。不仅李氏宗族多有文采,文武大臣喜

为篇咏,而且整个社会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气氛。文献载:“(李)建勋罢相江南,出镇豫章。一日与宾僚游东山,各事宽履轻衫,携酒肴,引步于渔溪樵坞间,遇佳处则饮。忽平田间一茅舍,有儿童读书声。相君携策就之,乃一老叟教数村童。惊悚离席,改容称谢。而翔雅有体,气调潇洒。”^①俨然一幅平和恬淡的田园图画,比诸同时期北方战乱不休、百姓涂炭的局面,宛如另一个世界。

南唐文化事业的成就,首先反映在人才的兴盛上。当地人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结构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大唐帝国号称文化极盛。而《新唐书》文苑、儒者两传所载家世可考之学者文士143人中,江淮地区仅18人,约占总数12.6%。及至北宋,比重大增。《宋史》道学、儒学、文苑三传所载北宋学者文士家世可考者134人,其中祖籍江淮者42人,占三分之一。再以宰相为例,唐代宰相家世可考者368人,其中江淮地区不过13人,仅占总数3.5%。及至北宋,情况大变。宋初,太祖有言:“不用南人为相”^②。及真宗破例以王钦若为相始,其后北宋家世可考之宰相53人,而祖籍江淮者达16人,约占总数30%。执政家世可考者228人中,祖籍江淮者的比例与宰相大致相同。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江淮地区政治与文化地位的显著提高。因此元宗李璟竟至数典忘祖,云:“自古及今,江北文人不及江南才子之多。”^③这一深刻变化,宋人已经注意到了,其说云:“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④其中南唐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南唐文化事业的成就,还反映在文化产品的丰富与文风的创新上。南唐的文学艺术、儒学均有突出的发展。文学方面,诗人辈出,传世之作甚丰。刘洞、李建勋、沈彬、江为、孙鲂、孟宾于、乔匡舜、丘旭、陈陶、伍乔、王周,皆为一时名家。南唐词苑,世属瞩目。李璟、李煜父子,冯延巳、张佖等人,一代词宗,千古绝唱。对宋代词苑影响深远。南唐艺术,以绘画成就为最高。董源之秋岚远景、徐熙之草木鱼虫、顾德廉之人物、周文矩之道释鬼神车服楼观,均为上乘,有“近世神品”之誉。其余如巨然、赵干、朱澄、卫贤、蔡润、解处中之山水花鸟,顾宏中、厉昭庆、高太冲、竹孟松之人物仕女,曹仲元、王齐翰、陶守立之道释鬼神,各擅其奇,称妙后世。南唐儒学,素称发达。史载:“五代之乱也,礼乐崩坏,文献俱亡,而儒衣衣服盛于南唐。”^⑤“五代僭伪诸国,独江南文物为盛。”^⑥著名的儒学人物,“如韩熙载之不羁,江文蔚之高才,徐锴之典赡,高起之华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价于一时。而徐铉、汤悦、张洎之徒,又足以争名于天下,其余落落不可胜数。”^⑦南唐学者传世之作,有数千卷之多。其中包括周礼、乐、小学、正史、编年、实录、杂史、政事、时令、地理、儒家、杂家、小说家、阴阳家、艺术、术数、仙释、别集、总集约二十类近一百六十种。^⑧其中有许多流传至今,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南唐在保存古代文化遗产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鼎盛时期。当时,国家藏书,“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⑨唐末大乱,“编帙散佚。幸而存者,百无二三。”^⑩宋初,国家藏书仅万余卷。而南唐藏书,竟达十余万卷,且“讎校精审,编秩完具,与诸国本不类”,以至时人以比鲁之存周礼^⑪。难怪张洎奉命入贡于中原,回来以后,作诗诋訾京师风物,有“一灰堆”之句。^⑫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随着大唐帝国的覆灭,正统的儒家学风扫地以尽。“读书不知今古”而好“属意于万物,有感于心,必冥而通之。”^⑬“兼览道、释书,通禅寂虚无之理。”^⑭这种新的风气逐渐在当地学者中间形成、扩散,无疑对宋学的出现产生了深远影响。刘敞、李观、王安石、朱熹、陆九渊等宋学大家皆出自南唐故地,绝非偶然。

中国历史上的分合,原因不一,结果也不相同。但是,与统一时期相比,分裂时期给予中国历史发展的助力也不可忽视。尤其是在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特别是江淮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宋代以后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南唐39年的历史尽管短暂,却不失中国历史发展史上辉煌的一页。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的一个关键环节,南唐不仅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且应该占有其历史地位。

① 周世宗:《赐江南国主李璟玺书》,《全唐文》中华书局

影印本卷一二六。

② 《十国春秋》中华书局标点本吴太祖世家。

③ 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知不足斋丛书《钓矶立谈》。

④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排印本卷二八一,后晋天福二

年。

⑤ 《宋史》中华书局标点本高琬传。

⑥ 《马氏南唐书》墨海金壶本副主书。

⑦ 《江南野史》豫章丛书本。

⑧ 梁太祖:《授钱鏐吴越国王册文》,(下转第56页)

等。这种本末倒置的研究方法,犹言所有的海外华人,其族源都出自“唐人街”一样,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这种研究方法,直到现在仍不绝迹。其后果,并不仅在于颠倒了族名与地名的因果关系。更为严重的是它阻碍了人们对古民族族称含义的正确探讨,影响了对古民族族源的正确认识。这种研究方法上的偏差,值得我们认识对待,并加以纠正。

总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东北民族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对东北民族的研究也不是孤立的,它同各学科发生广泛接触和联系。在研究中不是一重证、双重证,而是多重证,而是对相关的学科和领域要广泛吸收、引进和应用,以开拓东北民族的研究。”¹⁹对东北古民族族源问题的研究,尤其应该如此。只要我在研究的过程中,注意引起新的研究方法,宏观上比较,微观上考据,并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就一定能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深入,有所前进。

〔责任编辑 董铁松〕

- ① ⑭张博泉《东北古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东北史研究》第1辑,吉林省东北史研究会1983年版。
② ⑮《后汉书·东夷传》。
③ ⑯《急就篇》注。
④ ⑰刘俊勇《史前时期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文化交流初探》,载《东夷古国史研究》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⑤ ⑱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载《亚洲文明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⑥ 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对龙山文化的再认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97—103页。
⑦ ⑳张志立《东北原始社会墓葬研究》,载《古民俗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5—53页。
⑧ ㉑《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新发现的大汶口文化》,第86—96页。
⑨ ㉒逢振镛《东夷及其史前文化试论》,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⑩ ㉓林法《古文字研究简论·写在后面》,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页。
⑪ ㉔《史记·五帝本纪索引》。
⑫ ㉕杨光裕《地名学简论·地名词的结构》,东北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
⑬ ㉖《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
⑭ ㉗张博泉《论东北民族宏观与微观研究的统一》,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

(上接第37页)

- 《全唐文》中华书局影印本卷一〇二。
① ①《册府元龟》中华书局影印本卷四三〇将帅部乞师。
② ②《东轩笔录》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③《十国春秋》中华书局标点本楚拓跋恒传。
④ ④《十国春秋》中华书局标点本楚高郁传。
⑤ ⑤《十国春秋》中华书局标点本楚废王世家。
⑥ ⑥《十国春秋》中华书局标点本吴越忠懿王世家。
⑦ ⑦《十国春秋》中华书局标点本吴越沈虎子传。
⑧ ⑧《十国春秋》中华书局标点本南唐后主本纪。
⑨ ⑨《十国春秋》中华书局标点本南汉宗本纪。
⑩ ⑩《九国志》丛书集成初编本。
⑪ ⑪⑫《南唐近事》宝颜堂秘籍本。
⑫ ⑫《马氏南唐书》墨海金壶本周本传。
⑬ ⑬《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排印本卷二八〇,后晋天福元年。
⑭ ⑭《五国故事》说库本。
⑮ ⑮《江南野史》豫章丛书本。
⑯ ⑯《马氏南唐书》墨海金壶本党与传。
⑰ ⑰《陆氏南唐书》秘册汇函本江文蔚传。
⑱ ⑱《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排印本卷二八一,后晋天福二年。
⑲ 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P114、164。
⑳ ⑳《旧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食货志。
㉑ ㉑《册府元龟》中华书局影印本,卷五〇二邦计部平糶,卷四九八邦计部漕运。
㉒ ㉒《宋史》中华书局标点本食货志。
㉓ ㉓《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影印本一五七册,食货四十二漕运二。
㉔ ㉔徐铉:《御制杂说序》,《全唐文》中华书局影印本卷八八一。
㉕ ㉕《宋稗类钞》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
㉖ ㉖《道山清话》。
㉗ ㉗《江表志》墨海金壶本。
㉘ ㉘《容斋四笔》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
㉙ ㉙《马氏南唐书》墨海金壶本儒者传。
㉚ ㉚《研北杂志》四库全书本。
㉛ ㉛《宋史》中华书局标点本文艺志、《续唐书》文艺志。
㉜ ㉜《新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文艺志。
㉝ ㉝《宋史》中华书局标点本文艺志。
㉞ ㉞《马氏南唐书》墨海金壶本归明传。
㉟ ㉟《十国春秋》中华书局标点本卷三十南唐张洎传。
㊱ ㊱《化书》宝颜堂秘籍本。
㊲ ㊲《十国春秋》中华书局标点本南唐张洎传。

〔责任编辑 陈虹妮〕